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

杨富学

[提要] 回鹘与契丹关系密切。本文通过对史书中见于记载的契丹语言现象的考析，试图探询历史上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。

一 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与回鹘语文的关系

关于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与回鹘语文的关系，《辽史》卷64《皇子表》有所记载："回鹘使至，无能通其语者，太后谓太祖曰：'迭剌聪敏可使。'遣迓之。相从二旬，能习其言与书，因制契丹小字，数少而该贯。"据此，契丹小字的创制年代应在天赞四年（925）。

这条记载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。早期学者（如王静如、陈述、李符桐等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，认为契丹小字根据回鹘文创制。后来，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与研究的逐步深入，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。

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左右，是一种音素文字。这种文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，宋元时代一度是通行于河西走廊、西域、中亚诸地的文字之一，被广泛应用于书写诏诰敕令、宗教典籍、文学作品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等，并被蒙古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——回鹘式蒙古文，而且这种文字又间接影响到满文与锡伯文的创制。

契丹本无文字。辽朝建立后，耶律阿保机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。《新五代史·契丹传》指出："至阿保机…多用汉人，汉人教以隶书之半，增损之，作文字数千，以代刻木之约。"《五代会要》卷29也记载道："契丹本无文纪，唯刻木为信，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，就加增减，撰为胡书。"这里的"文字"应指契丹大字，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。那么，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？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：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，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。

从文献记载看，迭剌所创小字的特点是"数少而该贯"。由于是拼音文字，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，却能做到包容一切，把契丹语完全贯通。[①]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，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（1090年）李谦贞撰《郑恪墓志铭》中又被称为"小简字"。[②]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符文字，《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》、《故太师铭石记》、《萧孝忠墓志》属之，5年后新创的契丹小字是表音文字，《庆陵哀册》、《萧令公墓志》、《许王墓志》属之。

① 刘凤翥、于宝林：《契丹字研究概况》，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322页；《契丹小字研究》，第10页。

② 陈述辑校《全辽文》卷9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；向南：《辽代石刻文编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我们认为，契丹小字的制成与回鹘关系密切，首先是回鹘使者传授的结果，同时又受到了回鹘语拼音规则的直接影响。但必须承认，契丹小字与回鹘文字母本身并无多少直接关系，更谈不上与突厥卢尼文字母之间的关联了。

二　契丹语中的回鹘语借词

回鹘的语言对契丹语的影响也有诸多蛛丝马迹可寻。首先表现在契丹对回鹘语术语的借用上。在《辽史》中，我们常可见到一个不见于前代文献的术语“铁不得”。《辽史》卷20《兴宗纪》载：“[重熙十七年（1048）三月]丁卯，铁不得国使来，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，不许。”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又见于《辽史》卷36《兵卫志》和卷70《属国表》中。同书卷46《百官志》中还出现有“铁不得国王府”。“校勘记”对该术语是这样解释的：“铁不得即吐蕃，此与上文西蕃、大蕃等并是当时吐蕃不同部分朝贡于辽者，故以不同名称存于史册。”[①]说明“铁不得”与《辽史》中出现的“西蕃”、“大蕃”一样，其实都是指“吐蕃”的音译。我们知道，吐蕃是汉文史籍对古代藏族的称谓，而藏族则自称Bod，即“蕃”。那么，汉语称谓中的“吐”字何来？长期以来一直不得正解。近期，学者们通过缜密分析，指出汉语“吐蕃”其实是从突厥－回鹘语对藏族称谓 tüpüt 一词转借而来的。[②]此说既新颖而又有说服力，可以信从。那么，“铁不得”一词是直接借自突厥－回鹘语还是转借自汉语的呢？借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。

回鹘的职官名称更是为契丹所借用和效法。这里仅将笔者自认为比较有把握的部分标举如下：

1．可敦

《辽史·后妃传》：“辽因突厥，称皇后曰‘可敦’。”这里的突厥，其实指代的是回鹘。该词为回鹘语 qatun 的音译，二者音义完全相同。

2．夷离堇

又作“夷离巾、移里堇、俟斤”等。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夷离堇，统军马大官。”愚以为，该词当借自突厥—回鹘官号俟斤（irkin~erkin~erkan，“智慧”之意）。王民信更进而推定其最初来源为匈奴语之“奥鞬”，[③]自为得的之论。

3．惕隐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97引宋绶《上契丹风俗》谓：“惕隐，若司宗之类。”余靖《武溪集·契丹官仪》称：“惕隐司，掌宗室。”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惕隐，典族属官，即宗正职也。”该官号无疑来源于回鹘之 tegin“特勤／狄银”，指可汗的弟弟或儿子，只是词义有所变化。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称：“tegin，这个词的原义是‘奴隶’……后来，这个词为可汗家族的子弟们所专用。”[④]

4．于越

《辽史·国语解》称：“于越，贵官，无所职。其位居北、南大王上，非有大功德者不

[①] 《辽史》卷46《百官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768页。

[②] 安瓦尔·巴依图尔、克由木·霍加：《关于“吐蕃”一词的语源考证》，《新疆社会科学》1982年第3期；尹伟先：《维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》，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·别卷》1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5－51页。

[③] 王民信：《辽史“契丹语官名”杂考》，《契丹史论丛》，台北：学海出版社，1973年，第140页。

[④] 麻赫穆德·喀什噶里著，校仲彝等译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第1卷，民族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16－417页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授。”该官职在《宋史》卷4和《辽史》卷490中都可见到，而且常见于敦煌出土的9—11世纪的于阗语、回鹘语文献中。《辽史·属国表》：“统和八年（990）六月，阿萨兰回鹘于越、达剌干各遣使来贡。”很显然，契丹语于越一职当借自回鹘，原作 ügä 或 ögä，意为“尊敬的”、“贤明的”。[①]

5．达剌干

“长官”意。《辽史·太宗纪》：“诏以……达剌干为副使……县达剌干为马步。”《国语解》又谓：“达剌干，县官也，后升副使。”该词为突厥—回鹘语 tarqan“达干”（职官名）的借用。在突厥、回鹘中，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，地位十分显赫。据考，应系汉语“达官”一词的音转。[②]契丹借用时，意义有所改变，后又为蒙古语所转借。[③]

6．夷离毕（移离毕）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97引宋绶《上契丹风俗》谓：“蕃官有夷离毕，参闻国政。”余靖《武溪集·契丹官仪》：“藩官有参知政事，谓之夷离毕。”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夷离毕，即参知政事，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。”该官称显系回 eltäbir~iltäbir“鹘俟利发～俟力发～颉利伐”的假借。

7．详稳

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详稳，诸官府监治长官。”在《百官志》中，记有详稳司百余个，其官职高低随机构不同而变动。该词有时又被写作相温、详温或桑昆等，究其最原始来源，当为汉语“将军”之借词，但并非直接借自汉语，而应是从回鹘官号 sangun~sängün“相温”转借的。

8．挞林（闼林、挞领）

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挞林，官名。后二室韦部改为仆射，又名司空。”余靖《武溪集·契丹官仪》称：“其东北有挞领相公，掌黑水等边事。”挞林者，当乃回鹘官号 tärim“铁林”之借用。后唐同光四年（924），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美遣“都督李引释迦、副使田铁林、都监杨福安等六十人陈方物”。[④]其中的“铁林”成为人名的一部分。tärim 者，当系 täŋgrim 的派生词，[⑤]11世纪成书的《突厥语大词典》对该词是这样解释的：“tärim，对特勤、出身于阿夫拉西亚普王族的可敦及其各代王子门的专用词。除国王的儿子们以外的其他人，不论身份有多高，都不能对他们用这个词。”[⑥]二者名号相通，身份都很高，但词义已有所变化。回鹘专用于王子，契丹却不同，可用于对司空或边疆巡视官员的称呼。在女真语中，该词亦指边将，当为契丹术语的借用。

9．梅里（梅李）

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梅里，贵戚官名。”享有此官号者常受遣出使，如《新五代史·晋出帝纪》即载：“契丹使梅李来。”究其来源，很可能就是回鹘官称 biruq“密六～媚禄～密

① H. W. Bailey,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, 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, 1939, p.91; F. W. K. Müller,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, *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*, Phil.-hist. Klasse, 1915.

② 羽田亨：《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》，《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》下卷《言语·宗教篇》，京都，1975年，第331页。

③ 于宝林：《契丹古代史论稿》，黄山书社，1998年，第274—275页。

④ 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·朝贡五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影印本，第11420页。

⑤ P. Pelliot, Täŋgrim> Tärim, *T'oung Pao* 37, 1944.

⑥ 麻赫默德·喀什噶里著，校仲彝等译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第1卷，民族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36—37页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禄”的假借，其原意为“国王侍从”、“相”，在契丹中意转为“贵戚官”意。

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笔者通过对辽朝立国前后官号的使用与演变情况的比较，从中看出这么一种现象：以 916 年契丹——辽国建立为界，早期官号以契丹本土风貌为主，后期官号则有时借用回鹘术语，尤其是朝官与显贵称号，这一现象体现了契丹立国前后，回鹘影响的逐步加大、加深。

据考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名号即有可能来源于回鹘语。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谓：“余按辽太祖阿保机，或云：‘阿保之义为头，机为唯一。’是犹殷契之称‘余一人’也；然保机或与 bögü 音近有关。”[①]所谓 bögü，即突厥一回鹘语之“圣明”。突厥卢尼文《暾欲谷碑》第 34 行有言：bögü qaγan banγaru anča ayüdmïs“bögü 可汗对我如此说了。”[②]这里的 bögü 显然不是可汗的名字，而是尊称或尊号，bögü qaγan 在这里应为“圣明可汗”之谓。bögü 一词在敦煌、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更是频频出现。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移地健（759－780 年在位）受唐册封为英义建功可汗，回鹘语称之为 bögü qaγan，汉文“牟羽可汗”即其音译，意思是“圣明”，与今天蒙古语之 bögü 为同一词。[③]契丹语与回鹘语、蒙古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，故将“保机”一词与 bögü 联系起来考虑当非为无稽之议。更值得深思玩味的是，阿保机于天显元年（926）驾崩后，就先后被谥为“大圣大明天皇帝”和“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”。[④]

Abstract

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ighurs and Qidan since the Tang Dynasty (618-907), and, both Qidan language and script were influenced by Uighur language. The present paper holds that formulation of the Small Qidan Scirpt got the help of Uighur emissary. A lot of words in Qidan from the Uighurs.

（通讯地址：100871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）

① 饶宗颐《说占卜》，《饶宗颐东方学论集》，汕头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45页。

② С. Е. Малов,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.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, М.-Л., 1951, стр. 63.

③ 刘义棠：《维吾尔研究》（修订版），正中书局，1997年，第124～125页；杨富学：《西域敦煌宗教论稿》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1－30页。

④ 《辽史》卷2《太祖纪》，第24页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